香港 政情 方靖之

吸「獨」搶選票 反對派自尋死路

法院早前就2016年農曆新年的旺角暴亂案作出判決，梁天琦被判入獄6年、盧建民入獄7年，黃家駒則入獄3年半。以暴動罪的性質以及案件的嚴重性而論，判決實屬恰當，亦向社會各界傳達出明確信息：法官在裁決時都提及不會考慮事件的政治背景和主張，違法者不論有何政治理念，都不會影響法官的判決。這對於以爲政治理由是「免死金牌」的人，無異於當頭棒喝。**戴耀廷之流散播的所謂「公民抗命輕判論」，至此已經全面破滅。任何動搖法治根基、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暴力行為，法庭判刑將公正無私，不會手軟，可憐一些青年誤信歪理，最終身陷囹圄，前途盡毀，戴耀廷之流才是罪魁禍首。**

前罵後捧 雙重標準

對於這次判決，主流民意都認同彰顯了法治和公道，對於青年更有阻嚇作用。然而，事後除了一班激進派大力批評判決之外，一衆反對派政客亦紛紛出來「抽水」，美化梁天琦等暴徒是「有抱負的年輕人」，將他們形容爲被特區政府「打壓」；身爲大律師的梁家傑竟然指這次判刑太重，認爲應考慮社會大環境和梁天琦的個人資料，對於法官彭寶琴判刑時不考慮犯案動機和理由，認爲值得商榷云云；「末代港督」也走出來說三道四，指什麼《公安條例》「被濫用」，公然干預香港的司法。然而，這次判決眞的太重嗎？

彭定康的祖家2011年爆發「倫敦騷亂」，時任內政大臣文翠珊譴責騷亂行爲是「絕對的犯罪行爲」，要求違法者須接受制裁。最終40個觸犯暴動罪的犯人被判監，平均刑期達到5年3個月，主事者更被重判，如果按照反對派邏輯、按照彭定康的指控，英國政府才是眞正的政治迫害，爲什麼彭定康當年不出來指責英國的法例「被濫用」？香港是實行普通法制度，香港法官都是專業、獨立，並且接受英國普通法訓練，反對派指判決是政治迫害，這是對法官的抹黑和侮辱。

諷刺的是，反對派現在肉麻吹捧梁天琦，指控法庭判刑太重，但在旺角暴亂發生後，幾乎所有反對派政客都大力譴責暴行，更指應該依法懲處，當時一衆反對派政客急急切割的嘴臉，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可笑的是，現在法庭依法判刑，反對派的立場又一百八十度轉變，將當日的暴徒，變成今日他們口中的「英雄」；當年被狠批的梁天琦，今日變成吳靄儀口中「幾十年都未見過的優秀政治人才」。如此「前罵而後捧」，不但暴露反對派政客的雙重標準，更說明其爲了選票罔顧是非黑白，公然歌頌暴亂吹捧暴徒。

反對派的「變臉」眞正目的不過是要討好「自決派」，為之後的補選作準備。當年反對派譴責旺角暴亂，一方面是怯於公衆壓力，另一方面是因爲當時正進行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面對梁天琦來勢洶洶，於是反對派才要借旺角暴亂猛攻「自決派」，以拉抬楊岳橋選情。現在他們反過來吹捧梁天琦，其實也是爲了選舉。九龍西補選將會舉行，反對派要勝出補選，必須爭取「自決派」支持，但一直以來「自決派」與反對派牙齒印甚深，彼此勢成水火，「自決派」支持者根本不會支持反對派政客。爲了討好「自決派」，爲了得到梁天琦等人的支持，於是反對派才要借大力吹捧梁天琦，大力攻擊法庭判刑，來爭取「自決派」的認同，繼而令他們在之後的補選中支持反對派的候選人。

與「獨」同行 市民唾棄

然而，反對派機關算盡，恐怕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一是「自決派」對反對派政客的仇恨並非一朝一夕，過去傳統反對派多番打擊「自決派」，楊岳橋甚至嘲諷「自決派」人士「入獄令他們的人生更精彩」，至今仍然引起「自決派」的憤恨。因此，反對派的肉麻討好，根本起不了作用，反而被批評爲「抽水」，「自決派」人士更將楊岳橋、梁國雄、民主黨一衆以往的言行拿出來，指責他們以往如何攻擊「自決派」。反對派討好「自決派」的行徑最終只是徒勞。

二是反對派爲了選票吸「獨」，只會流失更多市民的支持。旺角暴亂的民意向背是十分清晰的，「自決派」開始衰落也是自旺角暴亂始，就是不少反對派支持者都不認同。但現在反對派爲了「自決派」的選票，竟然企圖爲旺角暴亂「翻案」，將暴徒美化爲「英雄」，將暴亂美化爲「革命」，甚至企圖以政治干預司法，向法庭施壓，損害香港司法制度。這些所作所爲，都是不得人心，只會令市民更加看清楚反對派的眞面目，看清楚反對派與暴徒是一丘之貉。反對派爲討好「自決派」結果只會因加得減，最終弄巧反拙。

從這次事件可以看到，反對派根本沒有是非界線，沒有法治精神，一味從政治利益考慮，對於梁天琦等暴徒可以捧爲「英雄」，對於香港司法可以公然破壞，爲了選舉利益，可以與「自決派」、「港獨派」勾肩搭背，反對派靠攏暴力與「港獨」，只會將自己引入死路，實在是愚不可及。

資深評論員

港鐵需「猛藥」治「沉疴」？

焦點 熱議 王曦煜

港鐵接連爆出多宗工程質量問題，獨立調查委員會亦已全面調查。公衆不禁要問這個備受社會質疑和公衆責難的港鐵公司，是否如同一些輿論所言，患了「沉疴」須得一猛藥「重劑」，方可恢復健康？

應當看到，不論是鐵路基建、鐵路管理，或鐵路運營，所暴露出的一系列或深或淺的問題，其實都最終指向港鐵公司的管理及監督工作。任何一個單一的問題，都不應該被「獨立分割」地以個案論處，「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伴隨着「一地兩檢」依法實施和香港「高鐵時代」的來臨，無論從社會整體利益、未來長遠發展，還是公共安全及納稅人利益而言，都是時候，對港鐵公司的運營監管模式、公共服務角色異化等尖銳矛盾，做一個深入的調整及優化。

接連出問題損公衆信心

港鐵向來是香港先進管理經驗的企業代表，港鐵服務也一直是香港市民引以爲傲之處。但近年來，在社會卻不斷存在負面觀感。一方面，作爲全港最大的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港鐵「只加不減」的票價，與「只多不少」的班次延誤形成鮮明對比，貴價低質的服務水平惹得一衆依賴港鐵出行的市民們怨聲載道；另一方面，作爲全港鐵路工程的項目管理人，所負責的一系列鐵路工程，接二連三爆出質量問題，從紅磡站月台螺栓連接鋼筋被非法剪短、土瓜灣站外牆鋼筋被削薄、到會展站懷疑未按程序挖掘趕工，壞消息簡直是「沒完沒了」。不斷考驗着社會的接受水平下限。

且最爲弔詭的是，港鐵公司似乎未能體現一個擁有先進管理經驗的大型企業所應具備的條件，失去作出迅速「問題自查」的能力，所出具的事故調查報告，不僅沒能講清楚關鍵責任誰屬，且有嚴重的避重就輕或者稱之爲文過飾非傾向，被社會輿論批評爲「差不多報告」，專業形象和誠信度，跌至新低。目前看來，港鐵的工程質量謎案，恐怕要依靠獨立調查委員會來給公衆一個清晰公允的答案了。從徹底釋清公衆疑慮的角度出發，調查委員會還要審時度勢，應該擴大調查範圍，避免問題「雪球」越滾越大，淪爲政治彈藥。

我們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圍繞港鐵的諸多問題表象，實際上都指向港鐵這一龐雜體系的根本性矛盾：屬性矛盾。港鐵其既承擔公共事業職責，同時又是上市公司，這種不公不私的結構性矛盾，必須通過強有力的外力平衡和政策工具，確保公共服務的性質和本位不受侵蝕。然而，強調商業原則和股東回報的港鐵公司，一早就出現了角色異化，在效益導向之下，港鐵業務愈益龐雜，鐵路本業被弱化，淪爲配角，而地產商務等則成爲重點經營內容。與此同時，憑藉公共交通服務供應者的天然便利，港鐵得以享受政府的許多政策紅利，令其能夠短時間內快速吸納社會資源，幾乎不費勁就成爲了市場的超級巨無霸。於是乎，我們看到，在制定票價時，港鐵強調其上市公司私營身份，但在向政府要資源時，立馬又切換成公營服務供應商角色，本該專職鐵路運輸服務的港鐵公司，對列車服務質素是否需要提升，票價是否需要減免等議題不停打太極，卻在本地的地塊買賣市場「積極進取」「不甘人後」，敢與一衆頂級房地產財團一較高下。

政府要加強監管角色

不可否認，不能簡單地對港鐵公司系列問題歸咎於其企業屬性，探討公營機構的管理與經營改良，平衡公私營的角色和本位，才是更爲務實的做法。政府作爲港鐵公司佔股達七成以上的大股東，應該切實拿出「治沉疴，下猛藥」的勇氣與決心，主動爲，善於利用政策工具和開創性思維，來平衡港鐵的社會利益和經濟效益，對公營服務達至社會效益進行監管，方不負公衆的期待，不負實質性角色職責。香港即將依法實施「一地兩檢」，香港740萬居民將步入「高鐵時代」，時代不等人，時代也不會留待我們慢慢來解決問題。

「電子煙」燒出變色龍公民黨

蕭政

政府提出立法規管「電子煙」及其他煙草產品的建議，將公民黨變色龍本色表露無遺。

昨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學會，以及中大港大醫學院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全面禁止新興煙產品。其間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向記者透露，世界衛生組織一直有控煙公約，以限制政策制定者與煙商交往，但有立法會主要政黨的春茗和酒會「竟然明目張膽有煙草商參與」，要求傳媒跟進。

雖然梁卓偉並沒有「點名」，但其後有傳媒便報道，過去一直收到煙草商的「暗示」，可以就「電子煙」問題向公民黨詢問意見；更有人曝光稱，公民黨2018年的籌款年會收取了相關商人購買宴會門券的款項。

本來，在監管「電子煙」問題上並不存在「非黑即白」的問題，要求全面禁止的聲音固然強烈，但支持政府有限度規管的，同樣大有人在。因此，公民黨是否支持全面禁止，本來並不是一個「大逆不道」之事。問題卻在於，公民黨見勢色不對，一再改態度。到了昨午，看到公衆質疑之聲來勢洶洶，該黨郭家麒又匆匆忙忙在立法會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全面禁止。

事實已經很清楚：第一，公民黨已經收取過煙草商的「款項」，這已無可抵賴。至於是否還有其他未經報道的「資助」，例如對議員私下的支持，則有待進一步核實。

第二，公民黨急於轉變態度，明顯是作賊心虛的表現。更可笑之處在於，公民黨昨日作出回應中稱，「絕不接受有任何附帶條件或指定用途之捐款」，問題在於，過去「傳媒黑金」曾不斷給予巨款，公民黨早就被質疑要唯其命是從，這又是否「沒有任何附帶條例」？

公民黨向來以「轉軚快」著稱，見勢色不對，隨時改變立場。而該黨現有六名立法會議員，基本上是每人有不同立場。這種隨勢而變的「變色龍」做法，相信是該黨的生存秘訣所在。

香港需加大吸引人才力度

學者論衡 陳文鴻

從當代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不是如十九世紀那樣由簡單的供求市場關係所推動。二十世紀開始，全球工業化的範圍擴大，競爭不斷增加，技術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技術的來源是人，是科研人才。

以美國爲例，經濟規模早在1870年代已超越英國，但二戰前美國的基礎科研水平仍落後於歐洲，直到1960年代美國的技術水平才開始超越歐洲，當中最大轉捩點就是二戰。戰爭期間大批德國科研人員到美國逃避戰火，同時大大改變了美國科研落後的局面。德國戰敗後衆多的科學家、科研人員分別被美國和蘇聯所羅致。戰後美國的核彈、導彈、航天等技術突飛猛進，都是由來自德國的人才作主力研發；二戰的戰時體制亦改變了美國的科研體制，開啓了美國以國防科技爲主的科研發展。而在這個過程裏，歐洲以至後來的亞洲精英移民則持續支撐着美國的科研發展。

而國際上最成功的科研國家是以色列。一是得益於建國時大量歐洲猶太人的回歸，也與美國猶太裔科學家社群建立鞏固的合作關係，以技術轉移來建立起新成立的國家科研體制。而1990年代蘇聯東歐變天，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便有大量科學家、工程師、科研人員從俄羅斯移居以色列，並與俄羅斯的科研體系維持密切的關係。以色列的科研名聞於世，建立的時間更短於美國，外來人才卻是最關鍵的發展因素。

中國的國防科技近年也迅速發展，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來自烏克蘭的技術轉移和烏國人才來華工作。人才是技術的載體，烏克蘭的頂尖科學家和科研人員來中國參與科研發展，使到中國許多自主研發項目，省卻了摸索時間。

即使如台灣，半導體發展依賴從美國回流的人才和與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密切關係，才造就今天的產業優勢，尤其是台積電更開啓國際半導體發展的新模式，在技術上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內地的半導體的崛起，始其來的是台灣半導體人才的轉移在上海發展。沒有台灣的人才、經驗，內地半導體會走上許多歪路。從這樣具體的例子來看，香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發展仍然可有許多機會。關鍵是怎樣引進人才，而不是單靠香港和大灣區大學培育的人才來推動創科發展。深廣等內地城市已懂得外來科研人才的重要，努力在政策配套方面增加吸引力度。但香港卻慢三拍，政策也落後。

事實上，以烏克蘭科學家在華工作的例子，香港與大灣區的政府應有步驟、有計劃、有重點地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精英，藉它們國家發展乏力，香港與內地資金充沛，產業發展和創業的巨大機會，來趁機吸納它們最積極進取和富有才能的人才。這不但可填補香港與大灣區人才不足的問題，更可以多元化的海外體制、文化、經驗，推動創新和科研發展。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笑面虎」特朗普的貿易戰算盤

國際觀察 顧鐮墨

兩周前，網絡被七國集團峰會（G7）的一張圖片「洗屏」，德國總理默克爾雙手撐在桌上，怒視着美國總統特朗普。特朗普則坐在櫈子上「翹起雙手」，毫不在乎地望着默克爾。峰會的火藥味彷彿從這張照片上透出來，深刻反映了美國與其他六國的分歧。

美歐同盟已名存實亡

確實，特朗普會前已表明在鋼鋁關稅上寸步不讓，在峰會上又連番發表「惹火」言論，在貿易及讓俄羅斯重新加入的問題上與六國裂痕巨大。在好不容易擬定聯合聲明後，因爲加拿大總統特魯多在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時表示會反擊美國徵收關稅，又惹起特朗普怒火。特朗普在赴新加坡參加美朝峰會的路上，還不忘攻擊特魯多，辱罵他「非常不誠實、非常弱」，又指示國務院不在聯合聲明上簽名，令峰會尷尬收場。

曾幾何時，七國峰會一直是「高大上」的俱樂部。七國是最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全球的經濟命脈。其他國家也以擠進這個俱樂部爲榮。比如俄羅斯在1997年被批准進入G7（成爲G8），成爲當時葉利欽最大的政績。2014年，俄羅斯因爲吞併克里米亞，七國也把俄羅斯開除出G8視爲嚴重的懲罰。

隨着包括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崛起之後，G20這個「擴大版」讓G7的地位相形見絀，但G7與G20最大的不同是，G7雖然以經濟議題爲主，但絕非一個單純的經濟論壇，共同的價值觀與政治也是其重要的議題與鏈接紐帶。更何況，G7國家在軍事上都是聯盟。因此，G7是一個有實際意義的集團，是美國盟國體系中的核心部分，G20則依然只能算一個論壇。

奧巴馬時期的美國強調軟實力，於是維護G7的一致性對他來說是毋須論證的。事實上，G7也確實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於是，雖然奧巴馬時代美國的硬實力下降，美國的影響力卻沒有明顯下降。但到了特朗普時代，強調「美國優先」，就連盟國也成爲針對對象。七國峰會的分歧就是特朗普要一意孤行地向各國徵收鋼鋁關稅，連六國這樣的盟國也無法得到豁免。

特朗普向六國徵收鋼鋁關稅完全缺乏理據，也沒有必要。特朗普理解的貿易利弊是典型的重商主義，簡而言之就是「順差就好，逆差就壞」。這種思路當然是錯的，且不說貿易逆差能換取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利益，即便按照特朗普的邏輯也沒有多大理由向盟國開刀。以歐盟爲例，歐盟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貨物與服務貿易之和爲1.1萬億美元，美國的逆差只有920億美元，只有貿易總額的8.3%（均爲2016年數據）。這在雙方龐大的貿易中並不太重要。

至於針對加拿大更是「蠻不講理」，是因爲2017年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有84億的順差，如果按照「逆差就是吃虧」，反而應該是加拿大吃虧才對。

特朗普又祭出「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即便承認這個原則，特朗普認爲徵收關稅能令「美國優先」的邏輯也完全錯誤。因爲鋼鋁都是製造最終消費品的原材料，美國製造業大量依賴鋼鋁。徵收鋼鋁關稅提高美國製造業成本，讓最終消費品價格提高，反而削弱了美國最終消費品的製造業的競爭力。有報告指出，鋼鋁關稅雖然增加鋼鋁行業的工作崗位，但使用鋼鋁材料的製造業中流失的崗位更多。如此通盤考慮，此舉又談何「美國優先」呢？最後的結果恐怕只有鋼鋁行業的工人感恩戴德，其他行業的從業人士蒙受損失罷了。

但放在美國選舉政治的框架下看，特朗普當然不是傻瓜。特朗普首先進一步固化了自己在支持者中「言出必行」、「美國優先」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選民基礎是大批的「銹帶」工業區工人，鋼鋁行業是這些地區的重要產業，特朗普要「箍緊」選民，這種實際上的「利益輸送」是最好的方法。但這一來不是得罪了受損行業的工人了嗎？不要緊，因爲在後眞相時代的宣傳中，簡單直接的邏輯永遠最受落（即便是錯的），要「繞一下」的邏輯（即便是對的）就難宣傳得多了。而且，鋼鋁行業的人是集中的，容易被共同利益拉在一起，政治選舉學中屬於易於動員的人群；受影響行業是分散的，從業員難以作爲有共同特徵的特定針對的可動員的人群。特朗普的選舉政治學的算盤打得可響了！

「美國優先」等同破壞協議

特朗普在上台後，由於堅持「美國優先」與「回滾奧巴馬政治遺產」，已經與盟國矛盾重重。他爲北約軍費問題，多次威脅「不協防」北約盟國。不顧盟國反對，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與伊朗核協定，又一意孤行地把駐以色列大使館搬到耶路撒冷，令中東重新動盪。他還不肯履行此前的接收難民承諾，大幅減低接受中東難民的數目。現在更在經貿問題上，爲蠅頭小利破壞與盟國之間關係。

一些領導人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希望與特朗普維持良好的個人關係，換取特朗普不對他們「開刀」。這個願望看來完全落空了。特朗普可以一邊大讚他們，一邊毫不猶豫地向日本法國徵收關稅，根本不顧情面。

其實，從特朗普一邊讚揚和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邊又破壞協議向中國500億美元商品徵關稅，就可以知道特朗普其實是「笑面虎」。歐盟主席不由得哀嘆，有這樣的朋友，又何需敵人？經此一役，G7已經失去了共同利益，「集團」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就在G7峰會召開的同一天，在太平洋彼岸的青島，中國召開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這是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後首次峰會。議題已經從成立之初的反恐，擴大到區域發展等經濟政治議題。成爲上合國家交流與建立互信的恆常機制。會議一團和氣，與G7形成鮮明對比。在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下，加上他自己反覆無常，即便此前對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心存疑惑的國家，也開始轉變態度，與中國合作。大家都知道，「合作共贏」比「美國優先」更有吸引力。

旅美學者